

投资者决策行为与信息披露

胡立雄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本文认为对会计师而言,理解投资者如何作出决策(实证理论)以及应如何作出决策(规范理论)是相当重要的。通过对投资者决策行为的研究,可能有助于提高财务信息准确地描述真实经济事项的能力;有助于理解财务会计信息的数量、类型和形式如何影响投资者的判断或预测;有助于理解决策者准确地对其认知的环境作出反应的能力;有助于理解投资者如何解决决策的复杂性,以及不同的决策风格对信息利用方式的影响。

关键词: 决策 信息披露 规范理论 实证理论

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具体应向外界披露怎样的信息,每个人对此都有各自的看法,观点不尽一致,甚至相互冲突,针锋相对。这也恰恰暴露了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如心理学和政治科学方面研究的不足,有待我们深入地进行研究。幸运的是,各方已经对年度报告的目标——即为投资者及其他年度报告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信息,且达成了共识。决策有用观在会计理论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其重要性在会计的定义中不断地被强调。如(美国会计协会 AAA)指出,会计是“辨认、计量和沟通经济信息,从而有助于信息使用者作出合理判断和决策的过程。”会计原则委员会(APB)主张会计的功能是“提供有关经济实体的定量信息,主要是财务方面的信息,从而有益于决策。”而FASB则认为,“年度报告在经济中的作用是提供有助于经济决策的信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公开发行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03年修订)》中第三条指出:“本准则的规定是对公司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的最低要求。凡对投资者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信息,不论本准则是否有明确规定,公司均应披露。”可见,我们需要研究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如何进行决策。如果我们可以确定其决策是如何进行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推导出什么样的信息对其最有价值。在研究使用者的决策及其对会计信息提供所产生的影响的过程中,会计理论家采纳了两种策略。一种是规范的方法——应如何决策;另一种是实证的方法——实际上如何决策。第一种方法中,人们一般从经济模型出发,试图演绎出经济模型运行所必须的信息;第二种方法中,研究的是个体如何利用手头的财务数据。从实证的角度进行研究相当重要,它可以洞察最为有用的信息。从规范的角度进行研究也同等重要,很多财务会计准则就是在规范的决策模型基础上进行逻辑推演。

一、规范方法

(一) 现行价值分析模型 人们最常使用的模型是现行价值分析模型,通过对两个方案的现金流量进行贴现后计算出的现值进行比较,从而对两个方案进行选择。美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就是建立在该模型的基础上。该模型过于简单,从而需要建立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该模型的反对者认为,模型过于简单,不能准确地描述经济现象。然而,支持者则认为,建立模型的目的是为了描述现实,而不是为了预测未来。

(二) 选择理论 选择理论从行动的动机出发,分析行动的后果,决定如何选择行动的偏好函数。后果一般以现金流量作为尺度加以衡量,当然也可以按照其他尺度进行衡量;虽然人的偏好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但仍可以通过广告、舆论宣传来影响人们的偏好函数。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对传统选择理论的最大化假设提出质疑。他认为在搜索信息需要成本的情况下,个体会选择满意的方案,而不是效用最大化的方案。

(三) 信息经济学 为了使上述选择理论更加符合实际,应将不确定性因素考虑在内。引入“状态”这个概念对可能的结果加以描述。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很难准确地了解行动的后果。经济学家通过估算每种状态的概率,并计算每种行动的期望值的方法来分析不确定的状况。这就需要专门的信息理论解释如何解决这种不确定性。早期信息经济学在信息分析领域方面的论著主要研究信息如何使得个体能够修订各种状态可能发生的概率,这就是所谓的决策前信息的作用。信息经济学使得会计师可以通过信息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效用函数——来更加深刻地认识信息的价值。FASB强调一系列能够给信息带来价值的质量特征,包括相关性、及时性和可靠性等。到目前为止,信息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已经表明,尚未发现信息的价值与这些质量特征之间存在必然的关联。信息经济学使我们会计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财务报表包含了大量不确定的估计;在会计信息免费的情况下,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是无止境的;会计信息只有在能够改变或影响人们的选择时才是有价值的。

(四) 代理理论 就上市公司而言,委托人是所有股东,而代理人则是管理当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称所有者为信息的评价者。信息评价者负责选择信息系统。他们所作出的选择必须使得决策者根据其获得的信息代表所有者的利益作出最佳的决策。代理人采取行动,而最终利益的效用函数则是所有者的效用函数;另外,还需要考虑代理人的效用函数,这是代理人采取行动的动机,这就使得问题

作者简介:

胡立雄(1974-),男,福建诏安人,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变得更加复杂。由于委托人总是对代理人行动所产生的结果感兴趣,因此代理理论为会计在事项发生后提供信息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持,这就是所谓的事后决策的作用。此作用经常与会计的受托责任的作用联系在一起,代理人向委托人报告过去所发生的事项。这就是会计除了提供预测价值之外所提供的反馈价值。我们可以从代理理论模型及其拓展中得到启示。此拓展主要与双方如何分享风险和利益联系在一起。管理者和所有者厌恶风险的相对程度给会计师提出了最有意义的问题。信息是降低不确定性的手段,会计师在管理者和所有者之间如何分担风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公司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所处地位及其对信息的掌握程度不同,因而公司的各种信息在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分布往往是不对称的,主要包括:管理层与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管理层与主要大股东之间信息不对称、管理层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有股东与潜在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一般来讲,信息不对称及与之对应的“逆向选择”所引发的各种问题正是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原因。

(五)集体决策理论 我们对决策的讨论及相关的信息需求主要围绕个体分别所作出的选择——甚至在代理理论中也是强调选择信息系统的所有者。集体选择的情况又是如何,这一原因对于FASB这样的政策制定者试图将所有年度报告使用者的需求都考虑在内。从技术处理上讲,他们试图对个体效用函数进行加总。惯常的做法是进行大多数表决来反映人们的意愿。然而,大多数表决通过并不意味着监管者就可以得出用以判断特定的决策是否满足投资者需求的总效用函数,需成立两个条件:(1)每个人的投票都算数;(2)只有在考虑可供选择的机会,且满足两种情况下我们才可以建立合理的集团偏好函数:每个人都无异议;集团偏好听命于某个人。换言之,给定这些假设,我们才能得出前后一致反映社会愿望的效用函数。然而实际的情况是,个体与社会所作出的选择一直都是不一致的,建立在这种不切实际假设基础上的理论所存在的问题相当严重,妨碍了构建集体决策模型。有关社会信息需求的理论研究滞后,导致监管者所要采取的行动缺乏理论支持。因此,尽管FASB尽可能表现出民主的作风,然而它们不可避免地将其意愿强加到某些利益集团的头上,除非所有的利益集团对征求意见稿的意见一致,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制订就是为了取得所有利益集团认可而进行的努力。它首先罗列了大量潜在的使用者,如投资者、债权人、经理、政府、雇员和公众,然后指出,所有潜在的使用者都对企业创造有利的现金流量感兴趣,其决策与预期现金流量的金额、时点和不确定性相联系。FASB得出的结论是所有使用者对信息的类型有相同的偏好。然而,这种观点似乎有些过于乐观。

(六)道德的角度 如何作出正确的决策,这是商务活动中应作出的道德判断。伦理学家已经提出很多方法指导决策。这些方法可以划分为两大类:道义论,强调实现目标的动机;目的论,强调结果本身。道义论强调什么是正确的,而目的论强调什么是有利可图的。道义论认为好的结果决不能为坏的动机辩护,而目的论则认为坏的结果会损害好的动机。(1)功利主义。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建立在效用理论的基础上,这是目的论的一个典型,完全强调行动的结果。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功利主义者认为,人应采取行动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监管者的作用是使所有社会成员的效用最大化。这就使得经济学家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帕累托最优的情况下,个体无法在不损害他人的情况下改善其状况。然而,社会不一定会选择帕累托最优的解决方案。FASB所作出决策的同时不可能只给大多数人带来好处而不损害另外一部分人。大部分涉及到信息披露的决策都将意味着财富将有可能从某个集团向另一个集团转移。换言之,年度报告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就是这个经济后果的驱使使利益集团在FASB对各种会计方法作出选择之前四处游说。会计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在以严格的效用理论看待信息的情况下,不存在客观的真实。信息与其他商品一样,是可以交易的。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是首先要商品,且与其他商品一样,其取得也会涉及经济选择的问题;在不确定性经济结构中,通过对信息问题的考察,我们可以对这个模糊的问题有比较深刻的理解。正如我们对商品的偏好程度不尽相同,我们对信息的偏好程度也是如此。(2)人权。探讨向潜在的使用者提供什么样的信息这个问题的另外一种方法的逻辑起点是伦理学,而不考虑结果。对伦理学的划分有很多方法,对我们来讲最为有意义的划分是人权理论和正义理论。人权理论认为,人天生就有权利。公众有权利了解与公司相关的财务信息。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英国会计准则指导委员会指出:企业报告的基本目标是告知有权利了解这些信息的人士有关实体的资源和经营业绩财务信息。在实体的业务活动会对某些团体和人士产生影响的情况下,这些团体和人士就有权利获取这些信息。另外,只有信息成本和保密这两个因素才可以限制获取信息的权利。FASB的两难之处是,其制订的很多准则具有经济后果,对某些人有利,而对另外一些人则不利。尽管如此,FASB还是认为其作用就是提供中立的、不偏不倚的信息,这种说法似乎有些牵强。然而,我们可以根据权利理论而不是效用理论对此加以解释。我们虽然无法发布对各方的效用影响都一样的准则;然而,我们可以发布对各方的权利影响都一样的准则。(3)正义和公允。正义概念是伦理学的另外一个分支。正义理论家认为,不应按照目的来引导正确的行动,也不应按照个体的权利,而是根据行动本身是否正义来引导正确的行动,换言之,根据公允原则来引导正确的行动。美国AICPA认为,公允仅仅意味着审计人员审查企业的年度报告是否遵循官方制订的会计原则;然而,一些著名的会计专家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理解公允性。会计学学者DR Scott试图将这些原则作为会计准则的基础:正义——财务报表所涉及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应得到同等的对待;真实——年度报告不应成为扭曲事实的手段;公允性——会计规则、程序等不应只服务于特定的利益集团。

会计的经济后果容易导致会计为特定的利益集团,如商界、监管机构、投资者或税务机关所俘获。财务会计的主要目标是从财务的角度反映一国经济中各部门之间相对权利和利益。实现这个目标的基本准则是公平地对待所有各方,而且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权利和利益解决相互冲突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资产负债表上反映的是公司在道义上权利(资产)和道义上的义务(负债)。合同——权利和正义的语言使我们有可能对会计信息需求有一个深入地了解。公司只有在得到社会公众认可的情况下才能够存在。某些人以公司和其利益相关方之间所达成的隐含的或明确的合同的形式来描述这种同意。现代会计理论借用了这个概念,在个人效用

最大化的背景下讨论这个问题。契约理论的另一种分析方法是从小数公允的角度展开。公司所承担的义务就是其与利益相关方所签订的合同的条款。对合同的任何违背就是践踏了公允原则。按照这种观点,虽然订约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可能会不履行合同,然而,如果履行承诺是社会所希望的,那么,我们可以预期,无论履约的成本和效益如何,合同将会得到尊重并履行,无论其是否得到监督。从效用的角度看,诚信可能是取代审计的一种低成本的做法。

二、描述性方法

前半部分主要从效用理论的角度讨论如何构建规范的决策模型。本部分主要讨论如何理解实际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整个讨论围绕两个问题展开:(1)公司是如何决定发布信息的内容,换言之,如何决定年度报告的政策;(2)个体在做决策时如何处理其接收到的信息,个体之间处理信息的技术是否存在系统差异。相关的会计研究试图从两个方面来探讨这些问题:一方面是利用心理学文献,并试图理解个体如何使用给定的信息集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行为会计”,行为会计的两个分支是信息处理理论和认知理论。另一方面是利用信息经济学、代理理论和有效市场相关的文献提出有关会计准则如何制订的假设。这种方法更多地从所有使用者的角度而不是单个使用者的角度来分析决策,这就是所谓的“实证会计”,这种叫法是否妥当尚值得商榷,本文在此不予以讨论。目前,学术界仍未对行为会计与实证会计进行整合。它们所分析的层面不同,前者分析个体的行为,后者分析总体的行为。目前仍没有一个模型描述如何将个体的决策予以汇总,从而作出公司的决策。两者在人类认知能力方面的假设也不同。行为会计更倾向于接受非理性行为,认为人类的计算能力相当有限。实证会计建立在理性行为的基础上,认为人类具有无限的计算能力使其效用最大化,行为学家倾向于指责经济学家不切实际。经济学家主张,判断模型优劣的唯一标准是其预测能力。因此,只要具有预测能力,即使最不切实际的模型也可能是相当可以接受的。

(一)公司报告政策 会计试图从经验的角度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选择会计程序。当然,在一定程度上,选择是由 FASB 代其作出的,但是仍然有足够的空间供管理当局选择。实证会计学者在规范决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相当有争议的假设进行检验。实证会计假定投资者、消费者、管理当局、雇员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相互之间签订了明确的或隐含的合同。对于这些会对利益产生影响的合同而言,我们必须假定合同的签订和毁约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在假定资本市场有效的情况下,当事人在监督合同履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遇到的问题通过市场的力量来解决:(1)管理当局与所有者签订的合同。实证会计研究的一个领域涉及管理当局与所有者之间签订的合同,这个领域与代理理论非常接近。所有者关心的是,管理当局所作出的决策与所有者的愿望一致,管理当局是诚实的、工作卓有成效,其决策能够尽可能大地增加企业的价值。激励管理当局的一种做法是让其持有股票,另外一种做法是将管理当局的业绩报酬与诸如净利润和收入这样的会计数字挂钩。对会计数字的利用使得业绩能够更加紧密地与净利润的具体构成,如增加的收入和减少的费用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如果这会给所有者带来利益的话,那么净利润的增加应导致市场价值增加。然而,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如果按照净利润确定管理当局的报酬,那么管理当局就会通过操纵会计规则或选择有利的会计规则来提高利润。管理当局会通过牺牲后期的利润来提高本期的利润,也会通过“洗澡”的方法来操纵利润:在出现亏损的情况下,管理当局会尽可能地冲销费用,从而使得以后可能会出现利润。(2)管理当局与债权人签订的合同。另外,一个得到广泛研究的是债务契约。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管理当局,尤其是在其持有股份的情况下,可能不会总是按照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的准则行事。因此,债权人经常会要求管理当局签订合同来保护其利益。如,管理当局会有动机发行求偿权优先于老债券的新债券,通过降低新债券的风险来降低其价格。这种做法会严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因此他们希望与管理当局签订合同来约束这种行为。(3)管理当局与社会签订的合同。实证会计还研究企业与各种政治团体的关系,及这种关系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假设规模比较大,且有一定政治影响的企业有动机将净收益递延到以后期间,这就是所谓的规模假设。这种假设与薪酬假设和负债/权益比假设相反。按照该假设,规模大的企业倾向于采纳减少会计利润的会计政策,从而避免引起政治家的关注。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来讲,事实确实如此。实证会计研究很少涉及管理当局与社会公众、雇员的关系。显然,我们可将上述研究成果加以拓展:管理当局是否会受到法律或法规的约束而为雇员提供安全的工作条件,或不会采取污染环境的措施,如果存在这样的法律、法规,那么是否会影响公司管理当局与年度报告相关的决策。如,新出台的社会政策可能迫使公司管理当局将外部成本的估计额纳入年度报告。

(二)投资者的财务信息处理 第二个引起会计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是使用者在决策时,如何分析他们所接收到的信息。相关的问题是个体之间处理信息的方法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如,有经验的投资者所使用的信息集合是否与无经验的投资者所使用的方法不同,如果公司能够更好地了解投资者和其他使用者需要什么样的信息,那么就能够针对这些使用者的需求设计更好的年度报告来帮助其决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有的实证研究成果仍然不完整和令人困惑。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决策将随着信息的增加而得到改善,直到因所提供的信息过多至使个体无法分析的情况下为止,这就是所谓的信息过载点。超过这个点,决策效果开始恶化。因此,人们倾向于忽略信息,认为这些信息是不相关的或不重要的。他们也倾向于使用汇总形式表现的信息。这解释了为什么诸如股票价格指数、每股盈余数字会受到欢迎。

在复杂的环境下,个体对发生概率不确定的未来事项相关的信息进行处理的能力相当有限,因此,他们自然希望简化这种复杂的情况,并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大拇指规则”可以很好地实现这一点。引起会计研究者注意的一个“大拇指规则”是不断修正的方法。不断修正(Anchoring)即个体选择某一信息作为起点,然后利用其他可获取的信息,进行调整后作出预测。如,投资者可能利用以前期间的盈余或每股盈余作为起点,然后再综合考虑有关企业的具体经济状况的最新信息来预测本年的盈余。不断修正过程的问

题是个体一般无法根据新信息进行充分的调整。也就是,他们没有遵循“贝叶斯规则”修正事前概率,从而使得修正的幅度不够。这一点对于会计来说相当重要,其理由是,个体一般没有意识到这种偏差,大部分人没有认识到其正在使用不断修正的过程。那么,为了降低修正偏差,我们在公布年度报告时应注意:首先,会计数字具有语义上的含义。如果会计数字所计量的经济事项能够为投资者所理解,那么出现修正误差的可能性就比较少;其次,这似乎支持尽可能使用市场价格而不是历史成本的论点。使用越过的信息作为起点,需要进行调整的幅度也就越大,因此发生偏差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然而,提出这样的建议应相当谨慎,目前尚没有对会计方面的修正偏差进行深入的研究,也就无从了解如何减少或消除这种误差。功能锁定,不断修正的一个结果是个体可能会表现出所谓的“功能锁定”行为。这意味着个体会错误地认为,他们就未来进行判断所使用的信号、汇总数或替代变量仍保持相同的经济含义和相关性,尽管其反映的内容或计算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就会计而言,这意味着投资者使用会计数字,如每股收益时没有根据会计技术的变化而作相应的调整。如,假设企业对R&D的会计处理由资本化改为当期费用,对报告盈余的功能锁定将导致错误的判断。会计政策变化所导致的报告盈余的变化并没有反映基本的经济变化(假设对税收没有影响)。一般性的发现是,投资者会适应会计程序的变化,但是他们在就企业价值进行判断时不会改变其解释盈余数字的内涵和重要性的方式。这些发现对年度报告相当有意义,这意味着使用会计程序的一致性相当重要。在会计程序发生重大变化时,可能应在调整期间报告在两种方法下所计算的两组数字。另外,还意味着会计分类和汇总应具备尽可能多的内涵,也就是,会计数字应尽可能根据经济现实加以解释。第三层含义是,为了避免对汇总的会计数字的功能锁定,对会计数据进行分解是有必要的。汇总的会计数字可能无法揭示基本的经济关系。由此得出,建立模型对实际的人类行为进行分析相当困难,因为数学模型难以处理是一种非理性行为,甚至是有限理性行为。尽管研究成果在揭示个体决策过程方面困难重重,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尽可能多了解会计背景下的个体决策。这种必要性包括:(1)改善个体决策的质量的可能性以及降低会计师和投资者处理信息的成本;(2)尽管信息与市场的关系目前尚未被彻底地揭示出来,然而有关个体决策的研究仍有可能改善提供给个体和市场的信息集合。

有关个体决策过程的研究可能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和改善投资者的福利。如果这种改善符合帕累托最优,那么这种改善就是可取的。下面我们就讨论实现这些目标的三种方法:(1)有关个体决策过程的研究可能提供年度报告应囊括什么信息的线索。对于整个市场而言,其所可以利用的信息数量没有上限,对于个体而言则有上限,因此,针对不同的投资者公布不同的年度报告的做法是可取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可以被用于测试某些信息对证券价格的影响,然而,我们必须有一些方式在进行市场测试之前确定公布什么信息,对潜在相关信息作随机选择的代价高昂。因此,对个体决策过程的了解将有助于改善提供给投资者的信息集。虽然市场在现有的信息集合下可能是有效的,但是采纳替代的信息集合仍可能会有助于改善资源配置,使得通过利用内部信息而获得垄断回报的可能性最小化。(2)资本资产价格模型建立在一定信息处理水平的基础上。对个体决策过程的研究可能会有助于提高投资者处理信息的能力。通过提高投资决策的质量,资源配置将得到改善,投资者所持有的投资组合将接近最佳水平,投资者的福利也将随之得到改善。有一种观点认为,虽然对投资者进行新技术方面的培训费时费力,但是市场将会很快地对这种新方法作出反应,投资者将会从中受益。然而,有证据表明投资者学习新技术的效率低下,这就对市场利用新技术的能力提出质疑。(3)改善投资决策的质量和降低信息处理成本的第三种方法是构建投资决策模型。投资者可以根据其意愿收集信息并利用投资决策模型来处理信息。这可能降低投资者处理信息的成本,并提高决策质量的一致性。然而,很多问题导致这个模型难以付诸实施。我们需要对投资决策模型作深入的研究,使得该模型能够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求,而且能够反映投资者所考虑的变量及其权数所发生的变化。

三、结论

如何决策与规范理论所描述的理性行为所作的决策存在偏差。如,功能锁定就是一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非理性行为,理性行为意味着人们不应没有实质经济内涵的会计变化作出反应。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规范与实证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差异。首先,行为会计研究是在个体的水平上进行,直观推断是对个体投资决策程序潜在偏差的描述。市场研究则在总体水平上进行。目前我们尚不清楚个体的偏差汇总在一起如何能影响市场价格。在总体水平上,个体的偏差可能会相互抵消,从而使得市场能够反映基本的经济关系。这并不意味着修正误差在总体水平上对会计不重要。偏差可能会影响到个体的福利,从而没有办法达到帕累托最优。其次,还有成本方面的考虑。很多合同是在会计数字的基础上签订的。如,管理当局的薪酬合约经常建立在净利润的基础上。由于这些合同的签订费时费力,因此在会计规则发生变化时,这些合同未必就会随着发生变更。这就是对功能锁定的一种解释,这种现象反映了个体受到其经济状况的约束。换言之,对公司而言没有任何实质经济含义的会计规则变化仍然对个体有实质的经济内涵。对人类行为的描述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从理性人具有超人计算能力出发,然后再考虑计算的成本对决策的限制;另一种是从人的有限理性出发,依赖大拇指规则进行判断,而不考虑成本对决策的影响。在对两者进行综合考察时,我们应注意,科学的发展是通过驳斥理论而得到推进的,这意味着理论应可以通过证据来辨别真伪;如果我们试图进行过多的综合,那么就会冒着将理论模糊化,从而无法驳斥的危险,科学也就变成教条。

参考文献:

- [1] "A Statement of Basic Accounting Theory",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1966.

(下转第 18 页)

由于会计信息的不对称性和具体使用者的非专业性,使失真会计信息被发现的可能性很小,我国目前对企业会计信息造假的处罚力度较轻,执法不严,对检查出来的会计信息造假事件往往是“重经济处罚,轻法律制裁;重单位处罚,轻个人惩处;重内部处理,轻公开曝光”。如,靠虚报经济增长率而得到提升的国家官员很多,但是因为制作经济增长假象而被降职或免职的官员几乎没有。因此,会计信息失真的成本过低,而收益巨大,这是我国会计信息失真屡禁不止泛滥成灾的一大原因。众所周知,银广厦虚增利润7.7亿元,而按照我国证券法177条规定可以对银广厦处以30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的罚款,所以,其被证券监督委员会处以最高额60万元的罚款(《国际金融》2002年5月第七版)。显然,违规处罚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造假缺乏威慑力。我们虽无法囊括失真会计信息的所有原因,但是存在刚性指标的地方,一般会有盈余管理和会计操作行为事件的发生,如配股曾经要求的净资产收益率为10%、6%,连续两年、三年亏损的特别处理等,均有明显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的出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当前在我国必须重塑会计诚信,建立具有法律意义上的信用经济体系,而“重塑”和“建立”,不能单从道德和法律层面着力,还得从财务监督的利益机制上有所创新。所谓“监督”,其实就是违规行为的受害者对于违规行为的收益者的一种利益制衡。国有资产作为会计造假的受害者,其掌管人未必有切肤之痛,也缺乏监管的动力;中小投资者作为会计造假的受害者,虽有切肤之痛,然力量分散,对造假者无可奈何。这就要从利益机制、企业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上有所创新,使各级国资委的工作人员的利益与国有资产的增蚀紧密挂钩,使中小投资者能够通过某种中介或代理机构有制衡大股东及其经营层的能力。财务监督有了有效的利益机制,会计制度的缺陷得到必要弥补,立法和司法上的“几重几轻”必须纠正,最终将形成对于会计信息失真的强大压力。

An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tortion

Liu Xilin

(Sh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Abstract :The article sheds a light on the mechanism for exercising supervision over financial activities by analyzing a number of false information in accounting on the basis of case studies involving some instances of meddling with statistical figures

Keywords :Fals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 Precept in accounting Supervision in financial activities (编辑 聂慧丽)

(上接第22页)

- [2] APB Statement No.4, "Basic Concept and Accounting Principles Underlying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Business Enterprises" (AICPA, 1978), par.9.
- [3]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Concepts No.1 (FASB, 1978), par.9.
- [4] Alexander A. Robichek and Stewart C. Myers, "Optimal Financing Decision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5, Chapter. 6
- [5] Richard P. Brief, "The Accountant's Responsibil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Accounting Review, April 1975, pp. 285-297.
- [6] G.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ust 1970, pp.488- 500.
- [7] Joel S. Demski, "The General Impossibility of Normative Accounting Standards", The Accounting Review, December 1973, pp.718- 723.
- [8] Charles Christenso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Accounting", The Accounting Review, January 1983, pp.1-22.
- [9] DR Scott, "The Basis of Accounting Principles" The Accounting Review, December 1941, pp.341-349
- [10] Maurice Moonitz, "The Basic Postulates of Accounting", ARS 1 (AICPA, 1961), p.4.

Investor's Decision Making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Hu Lixio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Understanding how decisions are made (positive theory) and formulating ways in which they should be made (normative theory) are important for accountants. Some of the objectives of studying individual decision making in an accounting context include: Firstly, a possible improvement in the ability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to portray accurately the real events; Secondly, an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amount, type, and format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ffect the judgement or predictions of the investors; Thirdly,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ability of the decision maker to respond accurately to a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Finally, an understanding of how individuals deal with complexity in decision making an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effect of the different styles of decision making on how information is used.

Keywords: Decision mak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Normative theory Positive theory

(编辑 聂慧丽)